

七姊妹

大石油公司及其创造的世界

〔英〕安东尼·桑普森 著



七 姊 妹

大石油公司及其创造的世界

〔英〕安东尼·桑普森著

伍协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HONY SAMPSON
THE SEVEN SISTERS

**The Great Oil Compani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75

根据伦敦霍德与斯托顿出版公司 1975 年版译出

七姊妹

大石油公司及其创造的世界

〔英〕安东尼·桑普森著

伍协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五七订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72,000

1979 年 6 月第 1 版 197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0 册

书号：4188 4 定价：1.10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安东尼·桑普森,是一个英国记者,长期从事跨国公司的研究,曾写过《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秘史》等书。《七姊妹》出版于1975年,是又一本论述跨国公司的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七姊妹》所论述的,是支配石油世界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即美国的埃克森、海湾、德士古、飞马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索卡尔),和欧洲的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在钢铁、汽车、石油、化学、电气电子、机械、造船、飞机、纺织和食品等西方十大主要工业部门中,以石油业的营业额最大,利润额最高。在1977年,上述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营业额共达二千一百三十五亿美元,资产总额一千六百零二亿美元,纯利共计八十九亿美元。诚如作者所说,“它们的收入比它们经营所在的大部分国家的收入还大”,“它们依仗石油主宰世界贸易的一半”。

作者在本书中,论述了在过去五十年中,这些公司如何建立起国际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国际垄断企业,它们如何在控制石油的决定性斗争

中，用秘密协定来瓜分世界，以及七家姊妹公司如何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作者还用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从六十年代开始，第三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如何同国际石油垄断资本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不仅夺回油价决定权，而且在石油国有化方面获得显著的进展。由于作者不仅广泛参阅了美国、英国和中东关于石油的著作，还引证了美国国会为对石油公司进行调查所举行的听证会的证词，以及听证会中透露出来的秘密协定和电报往来，又同国际石油工业的许多主要参与者作过多次谈话，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七大石油公司的内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际石油工业的发展过程和当前状况。

1978年10月

引 言

在本书里，我试图用政治的和通俗的语言来叙述当代历史上最奇特的故事之一：世界上最大和最关键性的工业怎么会被七大公司所控制；西方各国政府怎么会把很多外交职责委托给它们；它们对石油的控制怎么会逐渐遭到产油国的反对，直到1973年10月这种控制好象突然从它们手中被夺走似的。还有，仍旧是世界贸易巨人的七大公司，此后怎样发觉自己被逼得在政治上走起钢丝来，要在西方石油消费者的需求和它们同产油国的伙伴关系之间保持平衡。

我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或经济学家，而是作为一个持有记者证、可同任何人谈话和到处旅行的好奇的新闻记者，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有关石油的著作已经非常之多了。有归功于所有经理人员的详尽无遗的公司史。有关于石油工业经济的技术性研究。有在沙漠中进行钻探和开出自喷井的传奇性叙述。还有对各公司和卡特尔的本身罪恶的猛烈抨击。但是，迄今很少有人用通俗的语言来描写这些公司怎样兴起，那些平凡的人怎样卷入这种不平凡的业绩中来，以及西方国家怎样变得依赖这些奇特的公司的。

我最初对石油公司感兴趣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当时它们正在整个欧洲狂热地进行竞争。那时候我在《英国的解剖》一书中对壳牌石油公司作了长篇描述，这促使我同石油企业家

进行接触,包括那个首先使“七姊妹”这个语词流行起来的意大利企业界巨头恩里科·马太伊。之后,我对跨国公司的控制问题感到兴趣,写了《欧洲的解剖》(《新欧洲人》)一书,后来又写了一本《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秘史》。1973年9月起,我在华盛顿待了一年,那时恰好发生禁运和能源危机,我对石油公司的兴趣又大大激发起来,因为这些公司是最老和最大的跨国公司。

这些大公司在影响外交政策和改变全球关系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但是没有一批可靠的文件证明,要描绘或分析这些公司的作用是困难的。直到1973年危机时,大量的这类文献才披露出来,特别是通过参议员丘奇领导下的对外关系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的彻底调查。详细的证词、传讯备忘录,以及从这些听证会中暴露出来的秘密协定和电报往来,有些发表了,有些还没有发表,所有这些都对石油公司内部的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提供了难得的一瞥。这些丰富的资料使我撰写本书时得益非浅。

以这些可靠的文献为依据,我试图用随笔的体裁叙述经过情况,通过那些参与其事的人的亲身经历来描绘那些事件和决策。许多经济学家和石油企业家都倾向于把他们的工业描绘为受供求的铁的法则支配,不容许人们有选择或采取主动的余地。他们认为,如果这一行有什么真正的主人的话,那就是这种滑腻腻的液体本身,是它在改变着世界的均势。当然,原油的这种黑黑的、滑腻的特性,在我们叙述的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只要看一看石油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我认为不能无视把他们的个性强加在石油行业上面的那几个

强有力人物的决定作用——从洛克菲勒开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特丁和蒂格尔，到战后的象格蒂和马太伊这样的新兴者，直到今天的新石油巨头，包括伊朗国王和谢赫扎基·亚马尼在内。我就是通过这些人的见解和态度来叙述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的。

本书不打算阐明石油行业和能源危机的所有错综复杂的情况，也不涉及天然气、煤，或核燃料。也不妄求给中东政治和别处已经详尽地谈到的阿拉伯—以色列问题勾划出一个全貌；阿拉伯国家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比以色列多得多，只是因为它们拥有石油，并且与作为本书主题的各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描绘卷入的人物来写石油的历史，和表明我们时代这场不平凡革命后面人们的态度和心理变化。

在撰写本书时，特别是在前几章中，石油行业的许多历史分析当然使我得益不少，而且我充分利用了列入本书脚注中的那些权威著作。但我又同我所描绘的事件中的许多主要参与者作过多次谈话，以补充这些资料，他们帮助我了解历次石油决策时的气氛和各方面的看法。我尽可能遍访石油工业的主要中心：到过在伦敦、纽约、旧金山、匹兹堡的各公司的总部；到过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历史性油田；参加过维也纳和阿尔及尔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到过中东的主要石油生产国。我引述各方面——各公司、西方政府、石油生产国政府和工业评论家——的观点和评价，这样做是想使我的叙述能做到不偏不倚，让读者自行决定，如果有哪一方该受责备的话；直到最后一章，才提出我自己的结论。

这主要是一本论述石油的政治后果的书，而不是论述石油的经济基础，或者石油的工程成就，尽管这些都很了不起。我对自己企图把这些问题简化为基本的政治问题，并不想作什么辩解；因为人们越是研究那些重大决定（不管是1954年、1960年或1973年作出的），就越清楚地从决策人的证词中看出，这些决定都是比较轻易作出的。在比重、溢价、回扣和回购等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背后，许多石油问题既是涉及原油的问题，也是不够成熟的问题。

我想尽可能不讲行话，以使叙述流畅易懂。公司的名称是件特别困难的事，因为有些公司在它们漫长的历程中已经有变化。英国石油公司原先是英一波（斯）的，尔后是英一伊（朗）的；埃克森原来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来以埃索著称，因为它仍在欧洲；飞马本来是两家公司，即美孚油公司^①（简称“索可尼”）和真空石油公司，后改称索可尼·真空，再改称索可尼·飞马。在每一场合，我决定用它们现在的名称——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飞马——来统称这些公司。它们的名称虽然改变了，它们的特征却是连续性的发展。

不少人使我得益良多，因为一本这类的书要大大依靠局中人的合作和帮助。在各公司内部，我受到了不同的礼遇，但只有德士古干脆不合作（理由可在本书中看出来）。壳牌最帮忙，也最坦率，虽则易因小事着恼（读者也许注意到，只有它们拒绝让它们的标志和别家公司的标志一同印在本书的封套上）。飞马最健谈，英国石油公司则一贯最忠实。

^① 原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因在我国习惯称为美孚油公司，所以仍用习惯译名。——译者

许多公司内部为我提供情况的人希望不要提及他们的名字，但许多经理人员和前任经理人员却不厌其烦摆出他们的观点，尽管我抱怀疑态度。在埃克森，我特别感谢肯·贾米森、乔治·皮尔西、霍华德·佩奇、史蒂夫·斯塔马斯、埃米略·科利亚多和比尔·斯利克。在飞马，我同罗利·沃纳董事长，比尔·塔沃拉里斯总经理，赫布·施默茨和安德鲁·恩索尔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丹尼斯·邦尼和乔治·巴卢不厌其烦地想改变我的看法。在海湾石油公司，我很感谢吉米·李总经理和保罗·谢尔登，以及几位以前的雇员。关于德士古，我较多求助于前公司人员和股东。为了追忆德士古的早期历史，我对该公司创始人的女婿安德鲁·杰克逊·雷的丰盛款待表示感谢。

、在英国石油公司里面，我感谢公司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爵士、彼得·沃尔特斯、约翰·萨克利夫、朱利叶斯·爱德华兹和公司的历史学家罗纳德·费里尔博士所作的有趣论证，并对公司前雇员包括杰弗里·基廷、马丁·杰伊和阿奇博尔德·奇泽姆表示感谢，后者向我提供的关于科威特早期历史的情况非常宝贵，他还给我看了他的重要的即将出版的《第一个科威特石油特许权协定》一书（伦敦，1975年版）的校样。在壳牌石油公司内，我同格里·瓦格纳董事长、副董事长弗兰克·麦克法迪恩爵士和两位前董事长戴维·巴伦和约翰·劳登爵士进行过有益的讨论；而在休斯敦，我得到了美国壳牌石油公司总经理哈里·布里奇斯的教益。我还要感谢安德烈·贝纳尔、丹·塞缪尔、杰弗里·钱德勒和伊恩·斯基特，他们全都尽力向我提供情况，而又尽量不影响我的看法。

在阿美石油公司的许多职员中，我感谢约瑟夫·约翰斯通和纽约办事处的特德·菲利普斯，华盛顿的迈克·阿门，以及德黑兰的总经理弗兰克·琼格斯。对所有这些公司人员费了许多时间使我相信他们公司的观点，我表示感谢。但是这里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感激；所有我的旅行和研究费用，都是我自己出的。

我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城的访问中，和我的姻兄菲利普·本特利夫博士的殷勤接待中，得益不少。我从休斯敦人那里，特别从约翰·雅各布斯、菲利普·戴维和曼罗·奥伯韦特那里听到许多卓见；詹姆斯·克拉克给我作了指点，并把他的石油方面的珍贵藏书供我使用。在其他地方，我从许多对大公司提供侧面消息的石油专家和评论家那里得到帮助，包括保罗·格蒂、亨利·舒勒、查尔斯·珀利茨，《石油周刊》的乔治·斯潘塞，我特别感谢我在伦敦的朋友托马斯·马林斯的精明的观察。

在公司外面，我对许多政治家和外交家提供他们方面的情况和过去的决定表示感谢。在美国，他们包括约翰·麦洛伊、乔治·麦吉、詹姆斯·艾金斯、阿贝·福塔斯、乔治·鲍尔、托马斯·考珀，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雅各布·贾维茨和亚伯拉罕·里比科夫，以及众议员莱斯·阿斯平。在联邦能源署，我从梅尔·科纳特和帕梅拉·库克塞那里获得有益的意见。参议员丘奇对我的调查曾予以鼓励，我的朋友杰罗姆·莱文森在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耐心地指导我查阅他所搜集的纷繁证词；还有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约翰·亨利、杰克·布卢姆和比尔·莱恩也都花费了他

们不少时间；对以上各位，我表示特别感谢。在英国，我从许多过去和现在与石油有关的外交家和政治家那里，得到许多有用的意见；他们中间有肯尼思·杨格爵士、丹尼斯·赖特爵士、哈罗德·比利爵士、巴拉夫勋爵、埃里克·瓦利、休·弗雷泽，以及几位现任大使。在查塔姆大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路易斯·特纳的观察总是很令人鼓舞的。

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方面来说，我欣幸曾同三位较早期的秘书长进行了交谈；他们是伊朗的福阿德·鲁哈尼，伦敦的纳迪姆·帕查奇和维也纳的阿卜德拉赫曼·赫奈；还同现在在任的秘书长希弗·费伊德交谈过。我还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秘书长阿里·阿提加在科威特作过有益的谈话。在圣莫里茨，我同伊朗国王进行了交谈；在德黑兰和维也纳，又先后同他的石油大臣贾希德·阿穆泽加尔博士进行了交谈。在利雅得，我同石油大臣谢赫扎基·亚马尼，同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阿卜杜勒哈迪·塔哈尔博士，同计划大臣希沙姆·纳泽尔，以及许多其他人士进行过交谈。在巴林，我跟石油部长优素福·希拉沃和外交部长本·穆巴拉克谈了一下。在科威特人当中，我同石油部的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提基和阿里·哈利法，同科威特石油公司的艾哈迈德·贾法尔和苏莱曼·穆塔瓦，同科威特基金会的阿卜杜拉提夫·哈马德进行了交谈。在科威特，我还要对维奥莱特·迪克森夫人表示感谢，她允许我把她关于第一次石油特许权谈判协定的回忆记录下来。在外交家当中，我特别感谢阿尔及利亚驻伦敦大使巴拉希米和伊朗驻华盛顿大使扎赫迪的帮助。

在华盛顿的记者当中，我很感谢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华

盛顿邮报》的莫顿·明茨和劳伦斯·斯特恩。在伦敦,我得到《观察家报》的帕特里克·西尔、迈克尔·亚当斯和罗伯特·斯蒂芬斯、《金融时报》的理查德·约翰斯、《卫报》的彼得·希尔莫尔以及《新闻报》的马里奥·西列略的很大帮助。在石油专家中,我在纽约从沃尔特·利维和从《石油情报周刊》的旺达·雅布隆斯基那里得到教益;在贝鲁特,从《中东经济概览》的老板福阿德·伊塔伊姆以及他的熟练的新闻编辑伊恩·西摩那里得到很多帮助。

我希望,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料有助于从一系列不同的观点来叙述这个故事,我试图给这些观点以准确而清楚的表达。但是,在阐明我自己的观点时,我是没有犹豫的,特别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它只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我引用的书面材料均在本书的脚注里注明,并深表谢意。在说明石油工业的经济学时,我试图在诸位专家的争鸣声中兼收并蓄;其中著名的如保罗·弗兰克尔,他在1946年出版的《石油纲要》,是石油经济科学的先驱;伊迪丝·彭罗斯的《国际石油工业》(1968年),分析了“七姊妹”的财政结构和职能;莫里斯·阿德尔曼的《世界石油市场》(1972年),驳斥了关于竞争和卡特尔的许多早期信念。对上述头两位作家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我特别表示谢意。

在全书中,我反复引述了参议员丘奇的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的材料,即《跨国公司报告》,包括1974年和1975年的重要关系史,这是跨国公司 and 美国对外政策丛书的第四编至第九编(第八编和第九编当时正在付排,没有出版成册,所以在引用时无页数可查),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即

所称《跨国公司报告》，于1975年1月出版，包括有美国政府和各公司之间的重要关系史；它是以听证会上的证词为基础写的。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位编辑。纽约的瓦伊金出版社的艾伦·威廉斯，给我提了许多精明的建议和评论，使我的工作大为生色。伦敦的霍德斯出版社的艾伦·戈登·沃克，以坚定的耐心和幽默帮助解决本书的结构问题。我信赖我的写作代理人，即伦敦的A·D·彼得斯出版社的迈克尔·西森斯和纽约的斯特林·洛德，得到了他们一贯的支持。在整个工作的组织上，从旅行到调查研究，从打字到校对，我又得到了我的助手亚历克萨·威尔逊的不可缺少的帮助。至于这个计划从头到尾的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以及给予鼓励等，我都得到我的妻子萨利的持续不断的推动。在排版的速度和效率方面，我很感谢印刷者，即东基尔布赖德的汤姆森·利索印刷所。

1975年6月18日

目 录

引 言	1
一 谁控制?	1
二 洛克菲勒的家业	23
三 石油与帝国	57
四 瓜分	77
五 中了头彩	115
六 伊朗和民主	148
七 闯入者	181
八 石油输出国组织	201
九 在压力下的姊妹们	237
十 利比亚的最后通牒	266
十一 摊牌	296
十二 禁运	321
十三 算账	335
十四 新卡特尔	364
十五 诱惑	384

一 谁 控 制？

石油的友谊是油腻腻的。

卡洛斯特·古尔本金

1975年3月，我在阿尔及尔郊外的国家宫，看着代表们到来，感到眼花缭乱和迷惑不解，好象这是一出很长的歌剧的高潮。在明亮的非洲阳光照耀下，代表们在凯旋门下面显示的气派和狂热，使人感到就象一次胜利的行军或是一次福音传教士的集会。他们一队一队地走过头包白头巾、身穿绿外套、紧张地握着长剑的阿尔及利亚仪仗队，等候的官员们对每一批人都热烈鼓掌。下巴留着修剪整齐的黑色铲形胡子的阿布扎比酋长，摆动着耀眼的白色长袍，后面跟随着一群全身裹着白衣的人，只有脚上的高跟鞋才使人把他们辨认出来。小个子的厄瓜多尔总统拉腊将军，胸前佩着光彩的勋章和金色带子，轻快地走在他的高大的随从中间。上须留得很多的科威特埃米尔笑嘻嘻走来，后面跟着一队穿大红制服的卫队。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的贾卢德少校慢慢地走过，瘦削的身躯穿着一套大得不合身的双排钮扣西服。委内瑞拉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鬓脚几乎长到嘴边，庄严地行进，等候着他的宣传人员热烈鼓掌，陪同他走过去。伊拉克的铁腕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大步走在一群板着面孔的随从前面。在

这些阿拉伯队伍中间，还有温文尔雅的伊朗国王，同他的大臣们边走边谈，好象是一个穿着考究的银行家来参加这个奇特的统治者和革命家的集会。

在白色圆顶的大圆厅里，这个集会更象是一次宗教集会。环绕着圆圈，五光十色的各个代表团坐在他们的席位上：头一部分人都是黑色卷发，穿的是深色衣服，下一堆人都穿连有白色包头巾的外套，还有小环，真象是一片白餐巾的海洋。讲坛上站着东道国的主席胡阿里·布迈丁，他以笛卡儿的逻辑结合阿拉伯的修辞，在作他的一篇著名的冗长演说，议论中经常插进：“各位陛下，弟兄们”的话。讲坛上面挂着一个蓝底的神秘图案，画着四个不完全的白圆圈，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简称）这个有魔力的词。这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

十八个月以前，很少人会想到能够顺利地召开这样一个集会，不是由于对宗教或是武器的共同兴趣，而是由于对于一种黑色的油腻液体的共同兴趣。甚至在知道原因以后，也很难在那些大量的夸张言辞中弄清这场会议的情况。伊朗国王（再一次）指出，石油是一种必须妥善保存的贵重液体。委内瑞拉总统着重指出，这个会议不仅仅是讨论一般的能源，而是讨论“另外一种更加珍贵的能源，道德的能源”的会议。贾卢德少校说，石油必须成为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伊朗国王说，它必须成为创造“一个我们生活在其中感到荣耀的世界”的手段。而布迈丁主席则重申他常喜欢讲的主题：石油不仅仅是一种燃料，而是生命本身的源泉。产油国家必须成为复兴第三世界的先锋，石油是建成一个正义的公正的新世界体